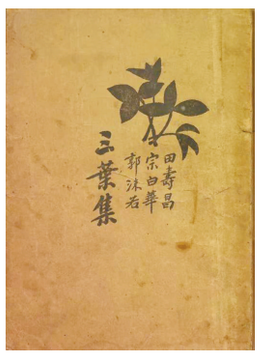
学林

新发现田汉佚文

二十余篇“东京特约通信”

■ 韩小慧 陈建华



◀ 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以三叶为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书中收录三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通信19封,1920年5月初版

▶ 田汉主编《南国月刊》,1929年5月1日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 1920年代的田汉

文匯学人 第590期

上海《商报》1922年3月14日刊登田汉的《咖啡小泽的一夜》一文,作为“东京特约通信”的“第一书”,至5月28日《流浪王——哈礼富兰客氏》为止,共刊登了23篇。通信数字连贯,5月9日《大地震之后》是第十六书,此后缺第十七、十八书。接着5月10日《东京第三回“劳动节”》标第二十书,5月11日《“莲花”的幻影》标第十九书(**田汉自标通信数字,此十九书是在5月1日从东京寄出,第二十书是在5月2日寄出,可能报纸先收到第二十书,照样发排。照此推断,报纸没收到第十七、十八书,故付阙如**)。此后5月15日《落花》标第二十一书,5月16日《中日广告战——以药品广告为中心》标第二十二书,接着最后三篇《黄庞追悼大会纪事》《“非宗教运动”与日本》和《流浪王——哈礼富兰客氏》,均不标号。这些文章未收入200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田汉全集》,迄今也不为研究者提及。

田汉于1916年8月作为湖南官派生赴日本留学,至1922年9月归国,这些文章作于即将归国之前,数量不算少,这里略作介绍。

在日本期间,田汉加入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诗人与劳动问题》等名文;他发表许多翻译与诗歌、剧本创作,又与郭沫若、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热烈响应“五四”新文化,主张个性解放和民主精神,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劳动阶级。董健在《田汉传》中说:“田汉一生读书最多、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学习、研究的视野遍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政治等领域”。“其思想色彩很‘杂’,倾向颇为‘多元’,但其实是‘杂’而有章,‘多元’归一,这就是他始终是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一个‘被绝望于旧世界而欣羡新世界的大思想’所鼓舞、所燃烧的热情的浪漫主义者。”

通信第一篇《咖啡小泽的一夜》,果然很田汉。他回国后创作剧本《咖啡店的一夜》,斐声一时,又在《银色的梦》中把咖啡店、汽车与电影视为“现代都市生活的象征”(《银星》第8期,1927年5月)。在《咖啡小泽的一夜》里,田汉作为“可思母”俱乐部(Cosmo Club)的会员参加了在神乐坂“咖啡小泽”(Cafe Ozawa)的晚餐会,遇见老友佐野袈裟美、秋田雨雀,新交柴田武富博士。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互相交流各国人文近况,富于国际主义气息,田汉和他们谈起世界语和新女性等话题。最后说:“回来想这一晚的印象,假如我们全人类的生活都像这一晚所遇的似的,那么这个世界岂不是理想的乐园吗?”田汉特别喜爱咖啡店,这篇文章提供了重要背景。

为《商报》做特约记者是一种社会实践,近十篇通信与日本的政治有关,为我们所知的日本期间的田汉带来新的面向。如《日本议会印象记》所示,他去旁听日本议会中各派的争辩,了解日本的政治运作程序。在《春雨声中的恶法谈》中批评新出台的限制言论的法律条文,在《日本的农民运动》和《东京第三回“劳动节”》中分析工人、农民及其社会运动的历史与现状,揭示议会制度下实行专制统治,摧残自由思想,并谴责资本主义对劳动大众进行压榨与剥削,特别警惕二战之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加藤友三郎之归国谈》对刚结束的华盛顿裁军会议作报道,在会上加藤友三郎代表日本与英、法、美、意大利签署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中国代表王宠惠要求废除各国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被置若罔闻。在《日本军备之缩小问题》一文中,田汉指出:“太平洋会议之后,中国更成了世界经济竞争场,这经济的侵略,比武力更可怕呀!”在这些文章里,田汉观点犀利,立场鲜明,《印度国民运动与日本》盛赞甘地所领导的反英殖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体现了国际主义的立场。

山额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今译桑格夫人**)在美国以提倡节制生育著称,1922年4月访问北京,受到知识界欢迎。《山额夫人与日本》《山额夫人会见记》两文讲她在3月里访问日本,遭到官方刁难,后来同意其入境,条件是不能公开宣传节育理论。田汉赞同节育,认为能减少女性痛苦和后代优生,并去她的旅馆拜访,作了几分钟谈话,预祝她访华成功。另外写了《评山额夫人产儿制限论》,也刊登在《商报》上。

田汉关注媒介,在他的早期著述中显得特别。《新闻制作展览会之一瞥》讲他看了各大新闻报馆的展览会,对报馆的部门分工、新闻的复杂制作过程、报馆结构和经营运作机制一一介绍。有趣的是《中日广告战——以药品广告为中心》,田汉嬉笑揶揄地指出,虽然中国的药品广告的“近代性”不及日本,但两国的广告同样恶俗不堪,如最多的是关于医治花柳病、肺病的广告,在中国也一样,因此中日同样患了“国民病”,可说是“难兄难弟”。

关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国公使馆之一夜》讲中国政府没按时给留学生发资助公款,他们在驻日公使馆因为讨债而住了一夜的经过。看到客厅里悬挂着四位民国总统——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和冯国璋的半身肖像,他描绘各人眼神,或霸气或猥琐,皆德不配位,“我真不知中国公使馆的客厅中到哪一天才有我们引为荣耀、引为模范的振人格者的照相悬者!”《黄庞追悼大会纪事》讲留学生在东京举行黄爱和庞人诠的追悼会。两人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而被军阀赵恒惕杀害,赵也是杀害田汉的舅舅和启蒙者易梅园的凶手,因此田汉特别沉痛悲愤。

三年前田汉在《少年中国》上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这次为通信写了《惠特曼三十年的忌日》,其实是一篇游记。他去大阪访佐藤春夫不遇,然后到涩谷大街上闲逛,在书店喜欢两张照片,一是美女,一是惠特曼,钱不够,踟蹰再三选了惠特曼。《绿雨与啄木》介绍两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斋藤绿雨和石川啄木,4月13日是前者十九年忌,后者十年忌。绿雨厌恶喧嚣的都市,批判资本主义,具有“革命”精神,受俄国青年的影响而主张“到民间去”。田汉归国后把“到民间去”作为口号,也拍了同名电影,虽然未上映。《流浪王》热情介绍哈礼·富兰客(Harry A. Franck)的传奇般“诗的生活”。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未卒业而立志周游世界,历尽艰险,足迹遍及全球各国,到过日本和中国,以大量精彩的游记著称于世。最后引惠特曼的《坦道行》:“徒步开怀,我走上坦道/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向何方去。”

在《飞鸟山的樱花赋》中,田汉和易漱瑜、康景昭等四人去东京飞鸟山公园看樱花(此时,他与易漱瑜结束了柏拉图式“清纯恋爱”而同居)。这对留学生是一种奢侈,公费没按时发,不得已卖了三本心爱的书,才得到游乐的钱,因此戏称自己“资本家”。公园里,他看到一群“狂歌乱舞”的劳动者而想起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玉川游记》写他与易漱瑜和F君一起去玉川游玩,描写一路上景色,在农庄看到一派田园风光,十分快乐,突然一辆电车从坡上驶下,带来一股汽油味,然而“漱瑜小时爱闻洋油气”,不禁让人想起张爱玲也有这样的癖好,两人有得一比。

田汉是个影迷,在《银色的梦》里说他到东京的第一年看了梅丽·马克拉伦(Mary MacLaren)主演的《鞡》(*Shoes*,1916),印象深刻。在通信第十九书《“莲花”的幻影》里说他在“民国五年八月某夜偕同乡邓时冰先生在神乐坂文明馆观Francis Ford的《名金》,为第一次”。1916年8月是田汉刚到日本之时,应当比观看《鞡》更早。“莲花”的片名《莲花心出世》(*The Lotus Blossom*,1916),田汉观后大感兴味,“因为他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手里制作出来的映画!”剧情大意是梁成发明时辰钟,向皇帝建议代替国门上的圣钟,皇帝大怒,把梁发配京外,独有少女梅胎送他莲花一本。梅胎之父邝孚,以铸钟为艺,供奉于朝廷。一日圣钟破裂,又值鞑靼人入侵,皇帝迷信圣钟奇迹,命邝孚铸钟,不成,将杀邝孚。梅胎找到梁成,获得铸钟秘方,但须混合人血人骨,她为了救父,在铸钟时跳入熔炉而使圣钟得以制成。另外还有梅胎和邝松相恋及邝松杀死鞑靼王的情节,故事较为复杂,现今《莲花心出世》仅存12分钟胶片,大约难以知道全剧情节,所以田汉的记述值得重视。

扮演梅胎的郑美(Lady Tsen Mei)是比黄柳霜更早的好莱坞中国女明星,另外还拍过《为了东方的自由》(*For the Freedom of East*,1918)和《信》(*The Letter*,1929)。最近有研究者考证,郑美并非完全是中国人,其母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制片者把郑美作为华人而大肆渲染,另有好莱坞的种族和性别政治。的确,郑美在当时非常有名,中国人引以为傲,在1921年《影戏杂志》创刊号上有《郑美》一文,称她“为中国人争人格、扬国光”。看了影片,田汉也激动不已,“我们在日本看影戏,自来看见中国人演厮役、演恶汉,一出场,日本便连呼‘支那人’‘支那人’,偶然看见这样好的女优演主脚,并且是中国人自制的映画,大有坐‘南京号’‘中国号’横行太平洋上之感。”爱国之情激昂高亢。

《落花》也讲电影。《落花》(*Broken Blossom*,1919)是好莱坞大导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作品,讲伦敦一中国少年爱上英国少女娄茜,少女受父亲虐待至死,少年愤极,将他击毙。片中的中国人善良正义,使田汉产生好感,尤其对饰演娄茜的女星理丽安·季施(Lillian Gish)赞不绝口。该片1923年2月在上海映演,译为《残花泪》,因为外国观众觉得侮辱同胞而提出抗议,仅3天就被停映了。(**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资讯

查尔斯·泰勒为诗辩护?

■ 编译/本报记者 李纯一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1931—)是英美道德哲学尤其社群主义的重要人物。兴趣广博的他在《语言动物:人类语言能力的全貌》(2016)一书中预告,下一本书将展示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诗歌是如何与他所主张的语言理论合辙的。

这本书便是近日出版的《宇宙的连结:祛魅时代的诗歌》(**哈佛大学出版社**,2024)。《高等教育纪事报》刊发了马修·亨特的书评,他称这部著作虽有新意,却令人失望。

书评引用W.H.奥登的“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开篇,来对比泰勒的“诗歌之用”——泰勒在新作中为诗歌辩护,将其理解为宗教仪式的一种世俗化形式。

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旁》中写: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像是有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晖,
来自大洋和清新的空气,
来自蓝天和人的心灵,
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
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
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
(**王佐良译本**)

他所描述的正是泰勒心目中的诗歌体验。早期,宗教仪式的特殊目的是激发人的崇高感、一种更深刻的交融感,而在浪漫主义时期,是诗歌承担起这一角色。泰勒说,浪漫主义诗人及其继承者培育出一种“重新连接”的语言,以承担我们“与宇宙的连结”,并使之“以一种打动人的方式为人们所感知,从而恢复与它的关联”。

霍布斯、洛克和孔狄亚克等思想家提出“指称性”语言观,将语言的目的归结为信息的传递和思想的编码。泰勒则主张“构成性”语言观,强调语言具有独特的创造能力,“使新的目的、新的行为层次、新的意义成为可能”。熟悉J.L.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的施行性言语行为哲学的读者可能会感觉这点似曾相识,但与《如何以言行事》将诗歌归为“寄生物”范畴不同,《语言动物》经常借助文学作品来支持其论点。

但是,亨特认为,以历史论证为方法的《宇宙的连结》与注重理论性的《语言动物》之间存在根本脱节。泰勒试图在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诗歌中找到哈曼、赫尔德和洪堡的语言理论的印记,他将这些德国哲学家视为“构成性”语言理论的鼻祖。亨特指出这种思想史方法破坏了《语言动物》的立论基础——如果浪漫主义诗歌需要德国哲学家的支持才能产生符合“构成性”语言理论的“连结”,那便意味着这种理论受历史的限制。而《语言动物》的副题恰恰显示,它渴望说明“人类语言能力的全貌”——这是一个超越历史的抱负。

在亨特看来,泰勒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修辞学也即诗歌的形式。事实上,浪漫主义的美学事业屡屡受惠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诗歌形式的复兴。《宇宙的连结》试将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统合在思想史的框架下,然而在解释诗人如何使用他们的语言时,思想史只能提供一套有限的工具。

例如泰勒说亚历山大·蒲柏的《温莎森林》反映了当时的形而上学秩序,亨特则提醒,只有将这首诗放入格律精严的英雄双韵体,蒲柏才能让人产生错觉,深信他的语言是一面照向自然的镜子。用泰勒自己的术语来讲,即使语言看起来是“指称的”,它仍是以“构成性的”方式在工作。这是《语言动物》的一个重要见解,但《宇宙的连结》忘记了这一点。

文学批评依赖于细读,亨特认为泰勒的新著事关文学,却恰恰缺乏细读。对细读的漠视会滋生所谓“文学哲学”,他援引文学评论家南希·尤瑟夫的说法,认为这显示了“英美哲学中阐释学方法的萎缩”。

“寂乡”的中国文化使者

■ 姚远梅

今年是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这位印度著名诗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所创建的国际大学所在区域Santiniketan,去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有人将这片取义“和平安宁”的地方翻译为“圣地尼克坦”或“桑地尼克坦”,实际上,在中国老一代文人墨客眼中,该地有一个固定称呼——“寂乡”。它位于加尔各答以北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是泰戈尔的故乡,风景秀丽。泰戈尔1921年在此创建国际大学,1937年又支持谭云山在大学里创建中国学院,随后成为中印交流的桥梁。今天,我们在此回顾谭云山与泰戈尔的友情,以及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创建历程,稍展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

“怀着师尊的理想与使命”为中印学会奔走

谭云山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6岁时,父母亡故,被亲戚收养。他自幼勤奋好学,才思敏捷,高小毕业考入湖南一师,成为毛泽东的师弟。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谭云山不但加入新民学会、文化书社,而且积极组织文学团体新文学社、编辑《湖南日报》星期日增刊《新文学》周刊、创办中兴学社、担任过湖南全省学生总会主席等。湖南一师毕业后,他远赴南洋,辗转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1927年,谭云山在新加坡结识泰戈尔,两人一见如故,结成忘年交。次年,应泰戈尔邀请,谭云山偕夫人前往泰戈尔所创建的印度国际大学任教,从此与印度结缘,也与泰戈尔结下深厚友谊。

谭云山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泰戈尔是我老师……1924年他访问中国时,我刚刚从祖国出来。1927年,我在新加坡第一次见到他。当我看到他时,我就爱上了他,愿意竭诚为他服务。但是我对他的钦佩并不是从那时开始的,而是在此之前,我看过他在中国时的所有新闻,读过他在中国的所有演讲和讲座。我还读过他作品的所有中文译本和一些英文译本……”

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不久,泰戈尔鼓励谭云山组建中印学会,以促进中印文化交流。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受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徐志摩等社会名流的隆重欢迎,当时就产生在国际大学展开中印学术交流的想法,并得到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响应。在泰戈尔推动下,1931年,谭云山“怀着师尊的理想与使命”回到国内,拜访国内各界名人志士,为建立中印学会奔走。在谭云山不懈努力下,1933年5月3日,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任理事会主席,谭云山任秘书。次年,在泰戈尔积极努力下,印度印中学会成立,泰戈尔担任主席,谭云山任总秘书长,并规定该学会的六点原则:学习中印先进文化、帮助理解中印文化、提高中印友好关系、联合中印两国人民、创造人类永久和平、促进世界走向大同。中印学会建立以后,在加强两国学者的联系和交流,组织两国著名人士的访问,互派留学生,捐赠图书,发起筹款赈灾和慰问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印学会成立不久,泰戈尔又提议在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在此背景下,1934年,谭云山再次回国,为中国学院成立筹集书籍和捐款。据有关资料记载,1935年谭云山筹集三万一千七百卢比和中文书籍十一万册,次年携捐款和书籍返回国际大学,开始建造中国学院建筑。1937年4月10日,泰戈尔主持中国学院建成典礼时表示:“值孟加拉文化传统新年的今天,中国学院成立,标志中印文化交流变为现实。”时任国大党领导人的尼赫鲁委托其女儿英迪拉·甘地代为出席并宣读贺词。圣雄甘地也为中国学院成立发来贺电,表示“我希望中国学院成为印中之间新关系的象征”。谭云山任中国学院院长,学院全部经费由他向中国筹集。据印方资料记载,谭云山为中国学院所筹集的书中,仅佛经就有50万分册。

自中国学院成立以来,这里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乐园。曾先后来此访问或短期工作的中国艺术家和学者有: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徐梵澄、吴晓铃、丁西林、郑振铎、周而复等。徐悲鸿曾在这里工作过一年,与泰戈尔结下深厚友谊,并为泰翁画了大量肖像画,在中印艺术界传为佳话。

拥有中国书籍最多的印度大学

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成立后,谭云山藉此展开中印交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谭云山利用其与印度上层的私人关系,广泛寻求印方支持,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1938年4月,尼赫鲁、泰戈尔、鲍斯均致信谭云山表示支持中国抗战。次年谭云山借回国之际,积极推动尼赫鲁访华。同年8月,尼赫鲁访华,与国共两党领导人举行会晤。随后,印度国大党向中国派遣了由五位印度大夫组成的医疗队,分别是: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莫克华。这五个人的中文名字都是谭云山帮取的,每个人的名字中都加一个“华”字,借此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热爱。

谭云山亦积极推动中方要员访印。他还在印度多家主流媒体,包括《现代评论》等,发表题为《诉求良知》的文章,指出日本已开始侵略部分英属印度领土,印方各大政党应搁置分歧,携起手来,与英国人民一起积极加入反法西斯的战争,只有战胜德意日轴心国法西斯主义,印度才能赢得民族独立。这篇文章被印方誉称为极大触动印度各界人士的神经,从而促成他们团结起来决心加入二战,与英国并肩作战去战胜法西斯。因其在中印两国大声呼吁共同抗击外来侵略,二战结束后,谭云山成为中印两国的英雄。1950年1月26日,印度举办第一届印度共和国开国大典,特邀谭云山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谭云山继续为推动中印文化交流付出努力。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建交。而后,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从新德里来中国学院,令谭氏夫妇喜出望外。1956年9月,谭云山被全国政协聘为特邀委员,回国观光,见到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徐特立、萧三等湖南故友,并结识周恩来总理。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印时,接受国际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参观中国学院并进行捐款,回国后又向这里赠送一万多册图书。国际大学从而成为一所拥有中国书籍最多的印度大学。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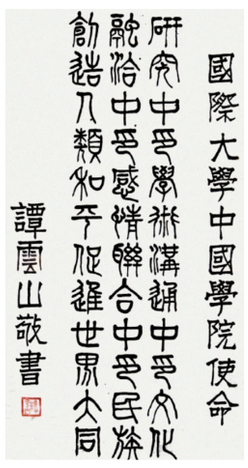
谭云山实践泰戈尔沟通中印的理想,游历了印度各地。1933年,他的《印度周游记》出版,蔡元培、于右任为题字祝贺,1935年又有《印度丛谈》,被国内一些学者誉为“我国近代以来第一位对印度了解最全面最深入的人,他的介绍很好地起到了帮助中国人民较多地了解印度的作用”。谭云山一生著述颇丰,自1937年起,有多部英文著作,讲述中印的文化交流、介绍研究现状;1949年《印度与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大同与亚洲联合》《中印文化的“不害”精神》引起不小的反响。他的成果至今是国内外学界研究中印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2011年印度外交秘书马塔伊在新加坡出席会议谈到印中关系时,直接引用谭云山的话说:“从我孩提时代开始,中印两国一直在我脑海中,中印关系是最重要的……”

2014年9月,中国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表彰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事业的人士。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阿维杰特·班纳吉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他用流利的中文表示:“泰戈尔当年为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克服重重困难,在谭云山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中国学院。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座金桥,通过这重要金桥,两国著名学者,频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增强相互了解和友情……我们一定沿着泰戈尔和谭云山先生开辟的友好之路,奋勇前进,为印中友好作出更大贡献。”

回望历史,泰戈尔和谭云山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是中印友好的一座丰碑,年复一年,闪耀着中印文化交流的光芒。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

▲ 谭云山与泰戈尔合影,1930年代



◀ 谭云山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使命”

均资料图片